



朔州历史文化研究文集

李尧 主编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朔州历史文化研究文集 / 李尧主编

太原市：三晋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457-0694-9

定价 100.00 元

【中图法分类号】K292.53-53（历史、地理＞中国史＞地方史志）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有关朔州历史文化的论文40余篇，论文集共分九个版块：历史变迁、人物精华、史实考辨、佛教文化、碑刻探秘、历史人物、西口文化、姓氏研究、古戏新探等，从不同角度探索了有关朔州的历史、文化、考古、民俗等方面的问题，可作为全面了解朔州的参考书。

【参考文献格式】李尧主编．朔州历史文化研究文集．

太原市：三晋出版社，2013.03.

序 言

李尧

朔州历史悠久，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千万年的积淀，逐渐形成朔州特有的历史文化板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广阔的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众多史学专家、学者甘守清贫，潜心研究，默默耕耘，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引起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为挖掘朔州历史文化开辟了一条坦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令人欣慰。

2004 年，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拉开了朔州历史文化研究新序幕，朔州历史文化研究步入一个全新的时期。研究会多方面搭建平台，开辟阵地，提供场所，热忱服务，一大批热衷于朔州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聚集其麾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对古人、今人、后人负责的原则，贯彻“双百”方针，对三晋文化进行创造性研究，探索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弘扬爱国主义，培育民族精神，为朔州物质、政治、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有计划、有重点、分专题、多视角地对朔州历史文化展开全方位的系统研究。历经九年的砥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先后出版了《朔州通史》（三卷）《朔州民间文化》（两卷）《雁北志集注》《朔州简史》《朔州历史文化丛书》（共出五辑、50 册）等数十部千余万字的专著。创办《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刊》，刊登了百余篇专题研究论文。值此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特将已发表的研究论文加以整理，分类归纳，积成一帙，冠以《朔州历史文化研究文集》之名，奉献世人，权作献礼。

统观书中的每份成果，各有侧重，各有千秋。字里行间，不仅阐释了许多真知灼见，而且散发着辛劳汗水的芳香，折射出孜孜以求的可贵精神。在获得启迪和教益的同时，令人感动、激动、震撼。在这里由衷地向广大历史文化研究工作者道一声：谢谢！

当然，成果并非尽善尽美，仍有诸多不足之处，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是为序。

2012 年 9 月 14 日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变迁.....	1
第二章 文物精华.....	80
第三章 史实考辨.....	121
第四章 佛教文化.....	150
第五章 碑刻探秘.....	179
第六章 历史人物.....	214
第七章 西口文化.....	286
第八章 姓氏研究.....	307
第九章 古戏新探.....	315

第一章 历史变迁

第一节 朔州历史文化的四个亮点

高海 张志弘

朔州，历史悠久，文化脉络清晰，文明进程从未间断，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民族杂居交融的人文沃土；边塞军事文化特征鲜明的地理环境；人民既有自幼习骑射的尚武传统，又有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特质；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亦影响深远。这些特色共同构成了朔州历史文化熠熠生辉的亮点。

一、典型的民族融合文化

朔州地处内外长城之间的塞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北方各民族相互争战、往来、徙居的重要基地，是北方游牧文化同中原农耕文化交汇融合的熔炉。

1. 频繁的民族交往与交流

朔州自古宜农宜牧，是多民族聚居的乐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此一时，为中原汉族所居；彼一时，为北地民族游牧。各民族间，或和睦相处，或金戈铁马，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兴衰交替的历史剧。夏为熏鬻，商为土方，西周为玁狁，春秋为戎狄，战国为楼烦所居。赵武灵王向北开扩疆土，破林胡、楼烦。从秦统一到汉初，匈奴强盛，大量掳掠汉人至大漠。至汉武帝强盛，曾从关中大量移民。东汉晚期，中原大乱，无暇顾及边塞，北部匈奴、鲜卑、乌桓南迁占据朔州地区。之后的魏晋和北朝，朔州地区仍是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共同活动的区域。隋唐与突厥往来，唐末沙陀族来此定居，北宋时契丹占领，女真崛起后继为统治者。元为蒙古族、清为满族占据。其间，民族之间，有战有和，有进有退，杂居共处，互通婚姻，彼此融合，取长补短，兼容并蓄。或往来、或互市，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每当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占据朔州地区，总会将本族的民众迁来。当他们被另外的北方游牧民族代替，或是被中原汉族收复，一方面他们大部会留居，另一方面，新的主人又会将其族民，或从北方，或从中原迁徙到朔州地区来。留在当地的各个民族，大都被同化为汉人了。

2. 众多的少数民族名人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文肇创一方文化。千百年来朔州大地孕育了众多的少数民族名人。

刘蠡升（？—535），山胡（稽胡）族，北魏孝昌元年（525）在云阳谷（今右玉县城东

北 35 里)聚众起义,自称天子,改元神嘉,设置百官,坚持斗争 11 年。

尔朱羽健,契胡族,尔朱荣之高祖,北秀容(今朔城区北)人。登国初为领民酋长,论功拜散骑常侍。

尔朱代勤,尔朱荣之祖父。因功免除一百年的赋税,授立义将军。

尔朱新兴,尔朱荣之父。家世豪强,财物丰盈,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物资粮草,助裨军用。

尔朱荣(493-530),早年袭父爵为第一领民酋长。后招兵买马,力量发展壮大,北魏统治者笼络他镇压农民起义。尔朱荣于乱世中南征北战,得以挟帝自重、权倾天下。最终为魏庄帝所杀。

库狄干,鲜卑族,善无人。北魏正光初年,拜任将军。后以军主身份随尔朱荣入洛。死后,赠封为假黄钺太宰,谥为景烈。

库狄士文,鲜卑族,善无人。隋文帝授他开府仪同三司,封湖陂县(今江西境内)子,寻拜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刺史。

乞伏慧,鲜卑族,马邑人。北齐文襄帝时为行台左丞,加封荡寇将军,累迁右卫将军、太仆卿,封宜民郡(今河南境内)王。

尉迟恭(585-658),鲜卑族,善阳人。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鄂国公,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谥曰忠武,陪葬于昭陵。

窥基(632-682),尉迟恭之从子。为唐玄奘嫡传弟子。

李克用(856-908),西突厥沙陀部人,出生于神武川之新城。为后唐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子李存勖建后唐,追谥克用为武皇帝。

李存勖(885-926),李克用长子,状貌雄伟,勇武过人。于公元 923 年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

李嗣源(886-933),李克用养子,沙陀族,应州(今应县)人。为五代十国时期比较开明的皇帝,他改革后唐弊政,有“小康皇帝”之誉。

米信(927-994),奚族,山阴米家岭人。少勇猛,善骑射。为宋太祖赵匡胤之心腹,死后,赠官横海军节度使。

此外,还有契胡族乙速孤佛保、唐括迪剌部族杨沃衍等名人。

3. 众多的少数民族文物古迹

朔州诸多的文物古迹,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在朔州地区的传播和影响,也是各民族相互融合的有力证据。

1986-1987年，在今平鲁井坪南梁一带发掘墓葬二百余座，大部分为春秋至战国时期，族属为北狄和林胡、楼烦。出土的夹砂单耳陶罐、“丁”字形骨器、玉石串珠等器物，都有着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

在平朔生活区发掘的大批战国至汉代的墓葬中，有不少器物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

在朔城区东邵庄村等地出土的夹砂陶腹、铜腹、铜腰牌饰和骨器，均有明显的游牧民族器形特征。

朔城区北关出土的北朝画像砖，上面的出行、狩猎、舞伎等图案是北方和中原两种文化兼容并蓄的风格，其墓葬不知属于哪个民族。

特别是北魏千佛石塔、应县木塔、崇福寺、鄂国公庙等更是少数民族所遗留的重要文物。

4. 多民族的文化特色

朔州，是多民族在此融合的地区，故而文化亦具有多民族的特色。

在当地的衣食住行方面，人们穿戴“毛鞋”、“狐帽”、“羔皮帽”、“白茬皮裤”、“白茬皮袄”；饮食上虽以杂粮为主食，但肉食、奶食亦很普遍，嗜饮砖茶，喜欢吃“盐煎羊肉”、“涮锅子”，喜欢煮浓茶、喝羊汤、饮烈酒；房舍多住窑洞；男女老幼善乘骑，出行多以马代步。这种风土人情与游牧民族风俗习惯颇有相同之处。

在当地的汉姓中，仍保留有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古姓。如春秋时期的戎、安、米、狄等，秦汉时期的党、单等，北魏时期的元（“拓跋”改为“元”）、蔚（“尉迟”改为“蔚”或“尉”）、穆（“丘穆陵”改为“穆”）、艾、郎（“叱奴”改为“狼”，后又改为“郎”），明代麻、贴、丁（“获独步丁”改为“丁”），清代的金（清开国以“爱新觉罗”为姓，“爱新”满语为“金”意，故后又改姓“金”）、罗（取“爱新觉罗”之“罗”）、洪（改“爱新觉罗”为“洪”）、荣、富（“富察氏”改为“富”）等。

在当地的语言方面，亦有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如蒙语“嘎渣子”（指不走正道，干坏事的人）、“忽辣盖”（指随便拿别人东西的人）、“圪图”（指四周用篱笆围起来的地方）、“不浪”（指木棒），满语“啃哪个呀”（去哪里的意思）等方言的流传。

二、典型的边塞军事文化

1. 战略重地

从地理位置来看，内长城南称塞内，外长城北称塞外，内外长城之间称塞上，朔州位处塞上，正好是在内外长城的包围之中。内长城上有依靠地理天险修筑的易守难攻的雁门、宁武、偏头外三关，外长城上有著名的出塞西口——杀虎口。过雁门关，经朔州地区，出杀虎

口，既为南北通商大道，又为重要的南北军事要路。

在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原王朝最大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游牧民族，而朔州正处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之要冲，同时这里也是中原王朝出击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军事基地。北方游牧民族如攻克朔州，可南下威胁山西乃至全国。对中原王朝来说，则可以出朔州，直接征服大漠一带的游牧民族。故而朔州确系京都藩卫、三晋门户、全晋巨防，兵家必争之地，历来为世人关注。

2. 军事设施遗存

朔州，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争战的大舞台。而今遗存的巍巍长城，险要的关隘，残破的城堡，圯废的烽火台，仍不失当年壁垒森严的气势。

朔州地处内外长城之间，内长城大部分在忻州和朔州两市交界沿线一带，外长城在今山西与内蒙古交界沿线一带。内长城黄土、石块、砖块相间连接，以凭险守关为主。长城线上每隔 100~800 米筑有墙台或敌楼，附近建屯军城堡，士卒平时屯田，战时出征。外长城主要为黄土夯筑墙体，以守边墙为主。

不管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把朔州地区当做稳固统治、扩展疆域的前沿，竭力修筑关隘作为防御工事。

长城沿线的诸多城堡，也是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旧广武城是雁门关下的重要城堡，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杨业曾在此与辽兵大战。新广武城比旧广武城地势更为险要，更有利于作战，明代在此设重兵把守。利民堡在明代与神池、八角及今五寨三岔堡，合称“四城堡”，是防御瓦剌、鞑靼的军事要地。今六县区的各个大村在过去几乎都有堡寨，而今右玉县更是城堡众多，烽墩林立，被誉为“中国古堡之乡”。现在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堡就有三十多座。右玉古堡大多建于明代，是明代大同镇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朔州境内的烽火台星罗棋布，绵延不断，伸向各哨所据点。从明《大同府志》记载可知，大同府境内共有烽火台三百三十座，其中属今朔州地区的有九十六座。《朔州志》载：在朔州境内，属大边墩有九座，二边墩有二十七座，腹里墩有二十八座，计六十四座。

3. 著名的古战场

2000 多年的朔州历史是一部民族战争史。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破林胡、楼烦与李牧守边退匈奴，西汉马邑之争、马邑之谋，东汉与南匈奴马邑大战，前秦灭代之战，北魏太武帝大破柔然与尔朱荣起兵，隋代李充马邑破突厥，唐代李靖出马邑大破突厥与石雄出马邑大破回鹘，五代后晋朔州军民抗割让与契丹屠城，北宋杨家将抗辽，金军亡辽于朔州，金代蒙古军占领朔州与吴僧哥、杨沃衍抗蒙斗争，明代右卫保卫战，清代抗粮反雍发斗争等等诸

多的“重头戏”曾在朔州大地上演。特别是黄瓜堆和金沙滩更是扬名天下的古战场。

北齐天保五年（554）三月，高洋于黄瓜堆（又称神堆、黄花梁，位于今怀仁、应县、山阴三县交界处）大破柔然。武后垂拱三年（687）八月，突厥寇朔州（今朔城区），武后以黑齿常之于黄瓜堆大破突厥。唐景福元年（892）八月，李克用于黄瓜堆大破李匡威与赫连铎。

北宋雍熙三年（986）七月，杨业护送云、应、寰、朔四州民众南徙，率军与辽军激战，即民间广为传说的“金沙滩大战”。“金沙滩大战”史书本无其说，其名称源于《血战金沙滩》《告御状》等传统剧目及评书节目。其实金沙滩是泛指今朔州市朔城区、山阴县及应县、怀仁一带绵延广阔的沙碛之地。当时，“金沙滩大战”的主战场，是在今朔城区的南部。

4. 尚武的传统

朔州为历代民族战争的拉锯地带，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当地居民便自幼习骑射，人人习武，个个强悍。一则为了自卫，二则为了参战。

史书对朔州人尚武的传统亦多有记载：

《汉书·地理志》载：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

《隋书·地理志》载：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

《大明一统志·应州》载：质直朴野，俗尚武艺，风声气息，自昔而然。

《山西通志·风土记》载：并州北有代、朔，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右玉，人习战斗，忠勇素具。朔州，其民敬老慈幼，节用恭俭，勤于耕耘，务于牧养。平鲁，习尚勇敢，有朴直风。

《朔平府志·方輿志》载：平鲁，习尚勇敢，以武职起家。

右玉《旧志辑录·风俗》载：明初设卫，逼邻冲塞，边警日至，人习战斗，世出名将，忠勇素具。

5. 众多的将帅

朔州居边陲要害，是历代兵事多发之地。特定的地理，频繁的战事，无数勇猛多谋的将帅应运而生。自汉，经魏晋、北朝、隋、唐、辽、金、元，至明清，驰名全国的将帅有数十名，在二十五史中有传记的和其他文献资料有记载的约 200 余人。真可谓“山东丞相山西将，山西将数朔州多”。

张辽、尔朱荣、尔朱兆、尔朱世承、尔朱世弼、尔朱天光、库狄干、高市贵、高阿那肱、尉迟恭、刘武周、苑君璋、高满政、李克用、李克让、李克脩、周德威、李存勖、安重荣、杜重威、郭崇、周密、周广、党进、米信、杨沃衍、郭志全、孙详、李宏、李瑾、刘铠、李梅、鲍崇德、麻贵、鲍承先、麻振扬、麻振汉、鲍敬等均为朔州籍著名将帅。

6. 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朔州，因系边塞军事重地，有浓烈的军事气氛，经常有南来北往的拉锯战，故而造就了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后晋天福元年（936），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遭到朔州军民的坚决抵制。后晋天福二年（937），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耻臣契丹，率军南归。辽会同四年（941）六月，契丹振武军（置于朔州）节度副使赵崇赶走了节度使耶律画里（一说刘山），献朔州归附后晋。耶律德光令宣徽使裒古只带兵围攻朔州。朔州军民誓死抵抗，耶律德光曾叹息说：“想不到汉族人这样难对付！”

金军占领朔州地区后，由于粘罕（宗翰）集团的残暴，天会五年（1127）应州（今应县）便暴发了震惊朝廷的反暴大起义，金将突哈速以10万精兵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金崇庆二年（1213），蒙古军攻占了西京（今大同），应州亦破，朔州、武州不守，北方大部分地区遭受了蒙古军马的蹂躏和践踏。是年，金顺义军节度使吴僧哥从蒙军手中夺回朔州。贞祐三年（1215）十二月，金宣宗令吴僧哥率朔州地区军民9万余口南迁，吴僧哥及其部下迪刺、曹儿等率军民与蒙军苦战七昼夜，方退出城池。在蒙军的尾追下，吴僧哥与军民且战且行。次年初，吴僧哥“力疲马蹶死焉”，时年30岁。所迁军民受到蒙军的掳掠和杀害。后来朔州军民自发组织义军抗蒙，保卫家国。义军先由朔州人杨沃衍率领。杨沃衍奉诏南走后，朔州军民又坚持斗争三年。

元太宗十三年（1241），应州人郭志全揭竿而起，发动了反抗元统治者民族高压政策和残酷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军很快发展到500余人，对元统治者震动很大，元西京留守兼兵马副使刘柏林派其子刘黑马率军前来镇压。起义军与元军周旋数日，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经由北京、大同攻占朔州之后，迫令朔州人民交粮、薙发。以交粮、薙发者为顺民，违者便是叛民，处以大辟（即砍头）之刑，或连坐亦被处斩。朔州城乡人民由卢、蔚两大家族领导，不交粮，不薙发，万众一心，一齐反抗。顺治四年（1647），辽东生员王家珍来朔州任知州。王家珍一上任，以异常残酷的手段，推行高压政策。朔州人民强烈反抗，流民在朔州西山一带经常商讨对策，并派人与吕梁山区的农民军取得联系，准备里应外合发动起义。顺治五年（1648），大同姜瓖反清后，派军攻占井坪，右玉起义响应。

姜派姚举攻朔，朔州军民起义响应。次年，多尔袞派军攻朔，破城后，将全城人民驱赶至城中心阁儿洞附近。清军官吏在东城头大喊：“出东门者为义民，出西门者为叛民，义民不杀，叛民杀。”宁死不屈的朔民争先恐后出西门，结果，被杀 700 余人。

三、源远流长的马文化

1. 黑驼山下猎马人

在朔州境内最著名的古人类，即峙峪村北黑驼山东麓的“峙峪人”。经考证，“峙峪人”生活在距今 28000 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当时这里的山上森林茂密，丘陵灌木丛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峙峪人”主要靠猎取野马为生，所以被科学家称为“黑驼山下猎马人”。可以说，“峙峪人”拉开了朔州马文化的先河。

2.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即将长袍宽袖服装改成紧袖短衣、长裤，腰系皮带，脚蹬长靴，并且以骑兵取代原来的战车，利于灵活机动作战。赵武灵王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改变作战方式，使养马、骑射成风。

3. 蒙恬筑城养马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始皇遣将军蒙恬发兵 30 万人北击匈奴，收取河套内黄河以南地区，并动用兵民筑长城，以备匈奴。当蒙恬备胡筑长城时，因当地盛产名马，而作战又以骑兵为主，便在朔境筑城养马，所筑之城故名马邑（今朔城区）。

4. 班氏以马起家

山西北部之畜牧业由来已久，尤以“代马”驰名于春秋战国之世。战国末年，秦灭楚国，楚国令尹（掌军政大权之最高官职）子文之后代，看中了山西北部的畜牧业，便来到这里，取名班壹。他利用其地宜于畜牧的自然条件和百姓善于畜牧的传统习惯，大搞畜牧业。始无定居，主要活动在班氏（今怀仁县东境）一带。秦始皇末年，班壹定居楼烦（今朔城区梵王寺村），以牧牛、马、羊数千群，而富甲天下，成为山西北部第一豪门大姓。秦王朝以班姓名县，置班氏县，楼烦亦置县。班氏为代郡属县，而楼烦为雁门郡属县，故班氏之畜牧区，地跨雁门、代二郡之地。

5. 尔朱荣以马称霸

北魏尔朱氏“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以马起家。尔朱荣以马北朝称霸。

6. 唐末“代北士马甲天下”

隋唐，当地盛产名马，唐末，李克用率代北士马，灭黄巢功居第一，纵横天下，四方诸侯闻风丧胆。有“代北士马甲天下”之称。

7. 辽金元明清的养马基地

辽代，朔州是重要的养马基地，曾一度禁朔州路马入宋。至“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辽史·食货志》）。

金代，据《金史·地理志》载：包括朔州地区在内的西京路，有群牧 12 处。大定二十八年（1189），马发展到 47 万匹。

元代，许多王公贵族在朔州地区将山地荒田，开辟牧场，甚至变良田为牧场，发展畜牧业，为元政府提供马匹等。

明清两代，朔州地区的养马业亦久盛不衰。

8. 现今的马文化

而今，朔州地区关于马的传说故事很多，如“依‘追风’马蹄迹筑马邑城”、“尔朱荣送‘毒龙’送天下，高欢得‘毒龙’得天下”、“尉迟恭擒海马”等。

以马命名的村庄和地名有百余个，如马跳庄、上马石、下马石、马蹄沟、马营、马庄、马港、赶马道、马头山、马鞍山、马营河、马堡桥等。

新中国成立后，今朔城区南部建有以驯养军马而著称的马场（今红旗牧场前身）。近年来右玉县将赛马场的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于 2011 年成功举办了“玉龙杯”中国速度赛马俱乐部联赛。

古人能以马起家、以马称霸，而我们当然亦应将马文化发扬光大，扬鞭跃马！

四、影响深远的佛教文化

1. 众多的佛教名寺

佛教从十六国时代的后赵传入朔州，到北魏太和元年（477），平城有寺约 100 所，僧尼 2000 余人。平城周围有寺约 6478 所，僧尼 77258 人。今朔州地区有著名的显明寺、崇虚寺、安福寺等。

唐代著名的佛寺有大寺庙（今朔城区崇福寺）、清平寺、天王寺、龙泉寺、觉兴寺、祖师寺、佛云寺、净土寺、佛宫寺等。

辽金时期，又有释迦塔、文殊寺、栖林寺、广福寺等。

元明清时期，朔州又有护国寺；应州又有大安寺、西天寺、永镇寺、殊海寺、普觉寺、福兴寺、洪明寺、中海寺、下生寺，至清末有寺 37 所；平鲁又有千佛洞寺、天门山观音寺等；怀仁又有永宁寺、天罗寺等共 84 所；山阴又有瑞云寺、卧佛寺、洪圣寺、得胜院寺、沙家寺等；右玉又有海藏庙、菩萨庙、观音庙、显明寺等。

2. 众多的佛教名僧

在朔州佛教历史上，名僧众多。东晋慧远为净土宗创始人，弟慧持亦为东晋名僧。唐代窥基为玄奘嫡传弟子，有论著 30 余部，草疏 100 余本，是佛教法相宗的创立者，窥基著作传入日本，法相宗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宗派之一。壁峰，元末明初名僧，在应州崔家庄大安寺修持。据传言，与明太祖朱元璋有特殊关系，故朱元璋当皇帝的第二年，即将壁峰召到南京，接见于奉天殿，并赐南京大天界寺给他，使其为该寺住持，亲制翰墨诗十二韵赐之，圆寂后安葬于大安寺，朱元璋令大学士宋濂为壁峰撰写了《寂照圆明大禅师壁峰金公舍利塔碑有序》。维绪，生于清末，19 岁时在五台山成果巷受戒。民国二十五年（1936）在净土寺立戒坛，为 129 人受戒。在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很有影响，佛教徒尊称其为禅师。大行，生于清末，1974 年把自己多年积蓄的 100 元人民币献给国家维修应县木塔。佛教界称他为大行禅师。净如，对日军入侵五台山时劫掠珍贵文物，坚决予以抵抗。当敌人搜出碧山寺的“华严经字塔”时，净如法师冒着生命危险争夺回来，又避过敌人悄悄地将其护送至上海密藏起来。民国三十一年（1942）1 月 28 日，日本侵略军进入应县下庄村天王寺杀死僧众 8 人。恩慧和尚（青年时当过兵）目睹侵略者的残暴行为，出于民族愤慨，一连杀敌 14 人，后壮烈牺牲，群众称其为佛教徒民族英雄。

3. 驰名的佛教文物

北魏千佛石塔，呈方形，高 2.5 米，共 9 层，上面浮雕有小佛坐像 1342 尊。原在崇福寺弥陀殿存放。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劫去。在搬运装箱时，原朔县城内爱国人士丁克成冒着生命危险，将塔剝藏起来。1953 年又献给崇福寺。塔剝残高 50 厘米左右，实为了一件珍品。日本战败投降后，塔身交还中国，被运往台湾，陈列在台北博物馆。现为该馆“镇馆之宝”。

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位于应县城佛宫寺内，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木结构塔式建筑。国内外建筑学界称为“建筑瑰宝”，享有极高声誉。196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塔建筑设计时，实用木材 3500 立方米以上，重达 3000 吨左右。在建筑设计上，改变了过去中心立柱方式，而用双层环形空间构架，全塔逐层斗拱向上垒叠，纵横交错，相互以卯榫镶嵌穿插咬合连接而成，无一根铁钉。1974 年 9 月，在维修木塔时发现了辽代文物 162 件，其中七珍与舍利佛牙 68 件。佛教七珍也称七宝，即金、银、琉璃、玻璃（水晶）、砗磲（贝类）、赤珠、玛瑙。佛牙舍利在木塔二、四层各出一枚，牙根凹处镶嵌有舍利子，为佛教至尊圣物。

右玉宝宁寺有一堂敕赐镇边水陆画，为明代皇家所赐的宗教绘画，共 136 幅，为国家一级文物。过去每逢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至初十，举行水陆道场，都要悬挂水陆画，结束后便收藏起来。

4. 隆重的佛事活动

1936 年农历十月初八日，朔县护国寺举行为期三天的“雪山会”纪念释迦牟尼成道日，全县僧徒居士诵经礼佛，做枣米粥供游人及穷人食用，就食者达三百余人。

1942 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崇福寺举行为期两天的“盂兰盆会”，参会僧人有从日本专程回来的日籍华人圆宏之徒道云，五台山寿冶禅师等 108 人。法会期间，念经设斋，盛况空前，水陆道场，规模巨大。

1990 年崇福寺重新开放以来，寺内游人常年不绝。每到农历二月十九日、四月初八日、腊月初八日等佛教节日，游方僧人及当地的善男信女们来这里进行佛事活动。上殿之时，钟鼓齐鸣，香烟缭绕，弥陀殿内东西两侧，法衣整肃的礼佛人员男左女右，分班跪拜，磬钹鱼鼓，奏响优美的佛教音乐，诵经之声与唱偈之调交相起伏，梵音阵阵，经声悠扬，月台上的转经队伍，宛若游龙，颇有声势。

2006 年 9 月 5 日，佛宫寺释迦塔举行建塔 950 周年庆典。善男信女以及各阶层人士齐聚城内，参加欢庆的有 10 万余人。应邀前来的慧礼法师、南非慧宽法师，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的大德高僧和四方僧众千余人参加了庆典和佛事活动。在庆典活动中，举行了中华龙应大钟揭幕仪式。大钟撞 108 响的同时，950 名僧人居士同唱《宝顶赞》，祝福明天更美好，人民更幸福。应邀来的嘉宾礼瞻了佛家至宝佛牙舍利和七珍八宝。此次旷古盛典，是朔州佛教文化举世瞩目之盛举，使当地之佛教事业以崭新面目出现，使佛宫寺释迦塔更加享有世界声誉，使释迦塔佛像内出现的佛牙舍利成为举世释家至宝。

第二节 朔州历史文化刍议

雷云贵

朔州是一方古老的黄土地。

远在二三百萬年前，大同和朔州地区是一片汪洋浩渺的大同湖。大约距今 30 萬年前，火山爆发，地段割裂，湖水泄尽，大同盆地出现了。

朔州地处大同盆地西南缘。三面环山，桑乾河蜿蜒中穿。优越的地理环境，是人类理想的生息地。早在 2.8 萬年前，“峙峪人”就在这里创造了桑乾源头的昌盛和文明。

天灾的危害，人口的增多，私欲的膨胀，促使人类不断地迁徙，不停地争战。朔州之地，有着充足的水源，丰美的草原，肥硕的马牛羊，再加毗邻大漠，地理雄胜，自然也就成了人类相互争战与交融之地。

夏商为戎狄之地，春秋战国为林胡、楼烦所居。后赵武灵王北破楼烦，扩地千里，设云中、雁门、代三郡。朔州地属雁门郡。秦兼并六国建立秦王朝，派大将蒙恬率军 30 万北击匈奴，在朔州之地筑城养马（实为驯马），城名马邑。这是朔州地区出现的最早城镇。汉王朝建立，改太原郡和雁门郡为韩国，韩王信从晋阳移都马邑。马邑的重要，匈奴冒顿自然也看在眼里，于是冒顿单于率 20 万大军围马邑。韩王信见寡不敌众，“亡走匈奴”。“亡走匈奴”的事件又引发了惊险的“白登之围”和残忍的“血洗马邑城”等事件。之后，汉王朝退让，与匈奴“和亲”，然而边塞的侵扰一直未停止。至汉武帝时，著名的“马邑之谋”，再一次拉开了卫青、霍去病与匈奴长达 14 年大战的序幕。

东汉中后期，南匈奴内迁，鲜卑、乌桓相继南下。几经争战，鲜卑拓跋以强代弱，终成华夏北方的霸主，马邑也成为京畿之地。在历史的舞台上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不久，先后又被北齐、北周代替。自东汉至整个北朝时期，马邑始终是拓跋、鲜卑活动的集中场所。北齐天保时，以马邑故城改置朔州。朔州以“士卒骁勇”的“齐之重镇”，有力地维护了高氏统治集团。北周灭北齐，进而又升朔州为总管府，成为北周屯戍设防的重镇。

隋唐时，北方崛起的突厥，不断向内地侵扰。而朔州首当其先，屡屡被“寇”、“掠”、“攻”和“复入”。隋末刘武周起事，就是在突厥的扶持下，占据山西大地，自称皇帝的。

唐灭亡后，中国又一度进入大分裂、大动荡时期。唐末，沙陀突厥李克用祖父一族，“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应县一带），进而朔州区域又成了李存勖入据中原，建立后唐王朝的战略基地。自后晋石敬瑭以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包括朔、应、寰在内的今朔州地长期又陷入契丹统治。取代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的北宋，以雁门为界，长期和辽形成对峙。作为前沿阵地的朔、应、寰三州，又成了宋辽两方的争夺地。辽会同四年（941），辽将裒古只率兵攻朔州战死。为其报仇，契丹攻下朔州城，尽将青壮年全部屠杀。“争城一战，杀人盈城”的残景，再次在朔州出现。辽统和四年（986），宋大举攻辽。潘美、杨业出雁门，很快收复寰、朔、应、云四州。不久，辽军反击，四州又失陷归辽统治。

辽国与北宋衰落，女真崛起强大，朔州之地再一次成为金灭北宋的战场。同样，蒙古族兴起后，在成吉思汗率军打金兵的战斗中，朔州仍是交战地之一。就是在明取代元之后的近 300 年之间，蒙古族的瓦剌和鞑靼从未停止过对北方边境的袭掠。地处内外长城之间的朔州地区，多次遭受掳掠与蹂躏。清顺治年间，大同总兵姜瓖反清攻朔州。清兵在镇压起义军时，遭到朔州城军民浴血抵抗，朔州城失陷后，再次遭屠城，大街小巷横尸遍地，血流成河。

朔州，从秦汉至明清，代代都有战事。

朔州 2000 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古代战争史。

特定的地理，频繁的战事，孕育出了无数勇猛多谋的将帅。自汉至清，全国著名的将帅就有 10 多人，在二十五史有传记和其他文献有资料记载的近百人。故朔州有“山东丞相山西将，山西将数朔州多”之说。三国张辽“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唐代尉迟恭以忠诚智勇成为唐王朝官员学习的楷模，并赢得了世人爱戴。唐代都督苑君璋、五代节度使周德威、北宋节度使党进、金代元帅左监杨沃衍、清代总兵史成等，均是多谋善战，屡有战功的将帅。更应值得注意的是，北魏的贺拔度、贺拔岳、贺拔胜一族，北齐的斛律金、斛律光、斛律钟一族，北朝至隋代的乞伏莫于、乞伏纂、乞伏惠一族，五代的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一族，明代的麻禄、麻贵、麻承恩一族等，均是一门三四代显赫一世的将帅。更值得提出的是，明代大将麻贵一生北征西伐，浴血奋战，一共擒斩倭寇及北虏 5600 余名。故时有“东李（成梁）西麻贵”、“将门有将”之赞语。

朔州之地不仅是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争战的要地，而且也是“和亲”、“附汉”、“迁徙”和互通关市的通道。几千年来，人们从雁门关至杀虎口走出了一条古道——马邑古道。马邑古道南延北伸，形成了中原通往大漠的大动脉，同时也是晋商文化通往中亚和欧洲的桥梁。马邑古道，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交流与交融，起到了重要的纽带及桥梁作用。

战争是残酷的，它给朔州带来了灾难与疮痍；战争是优胜劣汰，它也给朔州带来了变革与生机。战乱后的人口大迁徙，枭雄豪强的割据，聪颖贤明者的出现，为朔州的历史文化不断倾注了新的血脉。历史上朔州出现的四皇帝、六皇后、十三宰相，以及我国最早的女诗人班婕妤、唐代最著名的法师窥基等，即是两种民族文化之间渗透与融合的亮点。

特定的地理，频繁的战事，又造就了朔州人魁梧的身躯，强悍的性格，忍辱的精神。民族的融合，文化的交融，形成朔州区域文化的鲜明特色，如边塞风情，历代多战事，名人多将帅，农牧并举，以及踢鼓秧歌的遒劲、大秧歌剧的豪放、耍孩儿剧的悲怆等。

朔州旧城是一座有着 2000 多年历史的古城。在战乱与安定的轮回中，朔州的历史有过它的辉煌璀璨，也有过它的悲壮凄怆。

随着霸主的更替，时政防务的需求，朔州境内县、州、郡、军、府的设置，兵备防备的布建，也多是在兴与废的轮回中进行。除典籍文献记载外，而今朔州大地上，仍有不少幸存的遗迹。马邑、朔州、善无、阴馆、中陵、寰州、河阴、金城、日中城等古城废垣，均历历可辨。巍巍的长城，雄胜的关塞，残破的土堡，已废的烽台，还原地挺立。它们宛若座座丰碑，如悲似泣，向后人诉说着当年血与火的历史；它们又似篇篇乐章，如颂似歌，向后人传

颂着当年震撼人心的悲壮故事。

第三节 朔州——边塞的文化一面旗帜

丁一厚

地处晋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以长城为界的塞上朔州，是一个拥有 1.07 万平方公里土地和 170 多万人口的内陆新兴能源城市。回首奔腾的历史长河，朔州无疑是边塞要区；纵览蜿蜒的万里长城，朔州当然是边塞重地。硝烟散尽，铸剑为犁，体现边塞文化的物质遗址仍然屹立在朔州广袤的大地上，饱含边塞文化的精神因子始终荡漾在朔州淳厚的民风里。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朔州挖掘边塞文化精髓，彰显边塞文化风采，围绕边塞文化打造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代表城市形象的文化品牌。朔州是边塞文化的一面旗帜。

一、重要边塞地区历史悠久

朔州，在地理上是蒙古高原和中原的连接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杂居地，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具有深厚的边塞文化底蕴。

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朔州是历史上的边塞重地。中国北方西部多为茫茫沙漠，南北交通极为艰险。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南下主要以乌兰察布平原为前哨，冲击晋北。山西尽管多山，但多是近乎北—南走向的山脉，就像山西民歌中所唱的“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这样山西地势东西隔绝而北南相对畅通，形成北南贯穿的串珠状“盆地通道”。只有北部阴山余脉、恒山这两列大致东西走向的山脉，以及其上的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关隘等军事设施，形成盆地通道上北部的两道“门闩”。朔州就位于这条通道的北口，且在两道门闩之间。朔州北有险口杀虎口，南有雄关雁门关。杀虎口处层峦叠嶂、蜿蜒交错的塘子山、大堡山之间，雁门关在鸟飞难越的恒山山脉之上——两道山脉横断南北，是中原王朝北部军事防御的天然屏障。口以山险，关以山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杀虎口“直雁门之北，乱嶂重叠，崎路险恶，数水交汇，绾毂南北，自古倚为重塞”，“其地内拱神京，外控大漠，实三晋之要冲，北门之扃钥也”；雁门关“诚为重险”，是“中华第一关”，“得雁门者得中原，失雁门者失天下”。春秋战国，句注塞（雁门关）即为晋国和赵国北部要塞。三国、西晋、十六国、五代、北宋五个历史时期 450 余年，雁门关为中原王朝和北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分界边境。宋以前，中原王朝的外患主要在北部，幽（今北京一带）、并（今山西大部）、凉（今属甘肃）三州世称三边，并州居三边之中路，雁门关为中路要冲。北宋建立后急欲收回被石敬瑭割予契丹的幽云十六州，首收朔州。明代雁门关又成为保护京都的外三关之一。北方政